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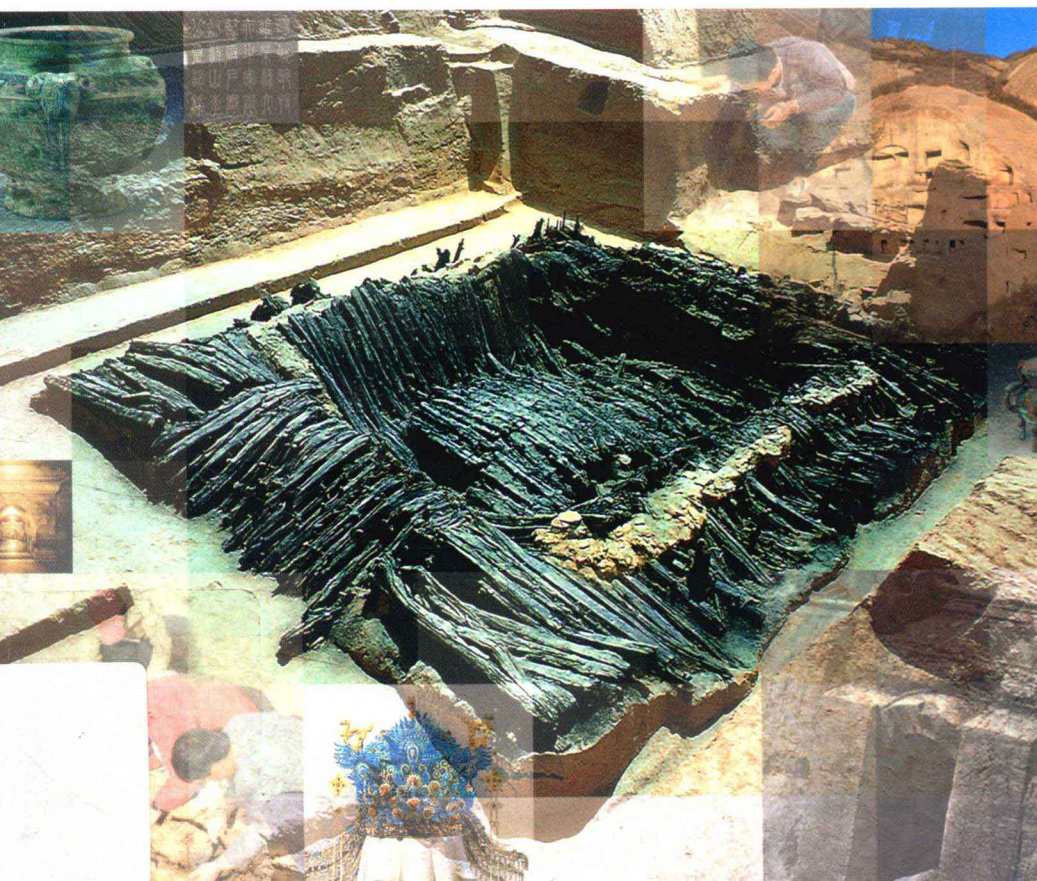
当代北京 考古史话

Dangdai Beijing Kaogu Shihua

当代北京编辑部 编
郭京宁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当代北京
考古史话
Dangdai Běijīng Kaogu Shihua

当代北京编辑部 编
郭京宁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北京考古史话/郭京宁著.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2. 4

(当代北京史话丛书)

ISBN 978-7-5154-0122-5

I. ①当… II. ①郭… III. ①考古工作—概况—北京市
IV. ①K928.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1512 号

本书图片为本书作者提供。因时间仓促, 不能完全确定摄影者姓名, 故未署名, 特向摄影者致歉; 并请相应著作权人见到本书后, 与当代北京编辑部联系, 以便支付稿酬及再版时准确署名。联系电话: 010—64872595

出 版 人 周五一
责任编辑 朱云波
责任校对 王小芸
装帧设计 北京雅顿纵横广告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154 66572264 66572132
市 场 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毫米 1/16
印 张 11.5 印张 2 插页 插图 53 幅 103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 (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当代北京史话丛书》编委会

顾 问：陶西平 范远谋

主 编：陶一凡

副 主 编：陶信成 陈德仁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建农 许 方 关丽娟 齐敬宁 李建平

宋传信 杨良志 陈德仁 张妙弟 金 汕

陶一凡 陶信成

出版前言

《当代北京史话丛书》，是由当代北京编辑部和当代北京史研究会组织编写的《当代北京丛书》系列中的一种。它以史话的形式，记述和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方方面面发展变化的情况，与读者朋友们一起回顾历史，认识现在，展望未来。

这套丛书力求既体现“史”的宗旨，即以真实的史料为依据，注重完整性、科学性、知识性，纵向脉络清晰，横向展现充分；又具有“话”的特点，即注重叙述的通俗生动和议论的简洁明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使广大百姓愿意读，喜欢读。这套丛书是已出版的《当代北京社会生活史话丛书》的延续和拓展。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当代北京史的研究成果，帮助大家了解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思想观念的变化，了解当代北京人创业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了解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这是当代北京编辑部和当代北京史研究会着力探索和追求的一个目标。近几年里，我们尝试着组织编写了一套《当代北京社会生活史话丛书》，包括《菜篮子史话》、《米袋子史话》、《餐饮史话》、《居住史话》、《服装服饰史话》、《公共交通史话》、《医疗史话》、《社会保障史话》、《民用能源史话》、《电视史话》、《阅读史话》等，已出版了三十余种。实践证明，这个尝试和努力得到了读者的认可。《当代北京史话丛书》将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去做。

书是写给读者看的。无论是丛书的内容还是著述的形式，我们都愿意认真听取读者的宝贵意见和建议，争取把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尽可能好些、再好些。

当代北京编辑部

2012年4月

引 言

考古学（Archaeology）在中国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在于根据古人遗留的各类物质资料，弥历史之阙缺，补文献之不足，拓研究之新域。物质资料包括各种遗迹和遗物，它们多埋没在地下，必须经过考古，才能被系统地、完整地揭示和收集。因此，考古学的基础在于科学的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

中国古代古物研究之风源远流长。东汉（1—2世纪）时已有“古学”的名称。《后汉书》中说马融“传古学”，贾逵“为古学”，桓谭“好古学”，郑兴“长于古学”。这里所谓“古学”专指研究古文经学，也包括古文字学。北宋中叶（11世纪），“金石学”在“古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研究对象是古代的“吉金”（青铜彝器）和石刻。公元1092年北宋吕大临所著的《考古图》率先使用了“考古”这一名词。大家熟知的欧阳修、赵明诚、李清照等文学家也是金石学的大家。到清代末叶（19世纪），金石学的研究对象从铜器、石刻扩大到其他各种古物，所以有人主张将金石学改称为“古器物学”。

名称万变，不离其宗，都是研究前朝的古物。因此，以“金石学”最为反映其本质，也最为人熟知。

尽管中国古代的金石学与近代的考古学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学科，但它们有着广泛的联系。

第一，金石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为前朝的铜器和碑石，特别是其上的文字铭刻及拓片，还包括竹简、甲骨、玉器、砖瓦、封泥、兵符、



明器等一般文物。这些对象也是考古学研究的一部分。金石学还创造了古代器物的名称，如钟、鼎、鬲、甗、敦、尊、壶等，都是古器自载其名称，宋人因以定名的。这些名称在考古研究中也应用。

第二，金石学以证经补史为研究目的，而这也是历史时期考古的研究目的之一。

第三，金石学上应用较为广泛的分期和分类研究方法在考古学中也有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对于夏商周三代乃至汉代的青铜器的分期工作，使得考古学在开创之初就有了一个纵向秩序的框架，是金石学家的一大贡献。例如金石学创造了传拓文字、绘制图形的方法；依据拓本刻本上石，以求长久；用画图绘制每一器物的形状体制，并说明尺寸、轻重，以及出土地点、收藏者、款识与摹写文字。这些方法也是考古工作者所需掌握的。

尽管传统的金石学与现代考古学之间有着如此之多的联系，但金石学并没有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直接发展成考古学，如李济先生语，“金石学与考古学正如古代的炼丹术之与化学的关系”。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田野考古学是20世纪初从西方传入的。

考古学与金石学有着本质的不同。

第一，前者以考古调查或发掘的实物遗存作为研究的核心和第一材料，而金石学只注重传世器物的研究。这是两者最大的区别。考古学强调研究资料来源于田野调查和发掘，因此通俗的称为“锄头考古学”，而金石学并不考虑研究对象的产生途径，且由于金石学偏重于文字的著录和研究，对于没有文字的古物不感兴趣。

第二，考古学的目的在于对古代社会的了解与复原，在于对消失历史的认知，而金石学并不明确具有这一目标，在经学和史学作为学术主流的时代，它的研究目的是“证经补史”，这是毋庸置疑的。在金石学者的视野内，文献是历史的全部记载，是历史原貌客观而全面的反映。故此，金石学家们每每考证一个器物的来龙去脉，必然要与文献发生紧密地联系，并且这种联系最好是具体到文献记载中的某一个事件甚至某一个人。例如吕大临在考证一件相传出土于新郑的鼎

时，就据《左传》把它说成是郑国子产受赐所作的。这种方法与《诗经》毛传上把每一首诗都贴上西周某人的标签的做法是一样的。从这个角度讲，考古学的视野更为宏观，金石学更为具体。

第三，地层学和类型学是考古学的两大支柱，而金石学多以“金石小学”称其自身，认为金石之学就是研究古代文字、音韵——从方法论上讲是传统小学的分支，将小学的一套方法，如训诂、音韵、文字看作其研究方法的主要构成，对古代青铜器的研究以文字的考订为核心。同时，考古学还注重自然技术手段、分析方法，例如碳—14测年、热释光技术、体质人类学研究等。这是金石学所不看重的。



CONTENTS

目录

引言 / 1

第一章 旧中国的北京考古（1918—1949） / 1

系统的发掘地下文物，在中国是从近代由西方传入，并开始兴起的一门新学科。北京考古所取得的重大发现，就是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的出土。然而，这几枚珍贵的头盖骨化石，却随着日本侵华全面战争的爆发，而命运多舛，最终不知所踪，徒留下了一桩悬案和种种猜想……

一、考古学的传入 / 2

二、周口店北京猿人 / 5

第二章 新中国北京考古事业的初步发展（1949—1966） / 17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考古事业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组织进行了文物普查和抢救性考古工作。对明朝的定陵、万贵墓，元代居址、西晋华芳墓，清代李莲英墓等的发掘和保护，极大地推动了北京考古工作的开展。

一、北京考古的初始 / 18

二、解密明定陵 / 22

三、清理明万贵墓 / 29

四、发掘元代居址 / 30

五、西晋华芳墓 / 33

六、清李莲英墓之谜 / 35





第三章 “文革”中的北京考古（1967—1976） / 39

“文革”期间，北京市的考古工作遭受了重大的干扰、破坏。但是仍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对元大都城和义门、旧鼓楼大街豁口元代窖藏、房山琉璃河商周遗址、大葆台汉墓等的抢救性发掘和保护最为显著。从被毁弃和回收品的废铜烂铁中，也抢救下来不少如“班簋”之类的稀世文物。

一、北京考古的缓慢发展 / 40

二、元大都城和义门 / 42

三、旧鼓楼大街豁口元代窖藏 / 46

四、房山琉璃河商周遗址 / 48

五、大葆台汉墓的黄肠题凑 / 59

六、废铜烂纸下的抢救 / 63

第四章 北京考古的春天（1977—1998） / 67

改革开放后，北京迎来了考古工作的春天，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其中以刘家河商墓、延庆古崖居、上宅新石器遗址、军都山山戎墓地、金中都、龙泉务辽代窑址、东方广场旧石器晚期遗址等最为突出。

一、北京考古的活跃 / 68

二、刘家河商墓 / 75

三、延庆古崖居洞窟 / 78

四、上宅新石器遗址 / 82

五、军都山山戎墓地 / 86

六、金中都考古 / 92

七、龙泉务辽代窑址 / 95

八、东方广场旧石器晚期遗址 / 97

第五章 北京考古的新时代（1999—2011） / 101

由于新技术的运用、新考古项目的启动，北京考古工作再次迈上了一个新台

阶。老山汉墓、东胡林新石器早期遗址、房山金陵、奥运场馆、南水北调工程、辽金家族墓，包括明代墓葬和旧城内的发掘，使得北京的考古工作，再次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一、北京考古的繁荣 / 102

二、老山汉墓 / 109

三、东胡林新石器早期遗址 / 117

四、房山金陵 / 123

五、奥运场馆工程中的考古工作 / 127

六、南水北调工程中的考古发现 / 131

七、辽金之际的家族墓 / 137

八、从考古学的视角看明朝那些事儿 / 146

九、旧城内的考古发现 / 159

参考书目 / 172

后 记 / 173



第一章

旧中国的北京考古（1918—1949）



一、考古学的传入

考古学传入之先，士大夫们受学术传统和科举制度的影响，习惯于在书斋中舞文弄墨，走出书斋、亲身调查的实证风气不被鼓励，致使中国金石学的发展远超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尽管热衷于户外运动者不乏其人，例如汉代的司马迁在自序中称：“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而归。”宋代的沈括推论太行山“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海已近千里；所谓大陆者，皆浊泥所湮耳”。他的研究方向已近于现代的“环境考古学”。元葛逻禄乃贤著《河朔访古记》前，自浙江游历大江南北，考察古迹古物。夏鼐曾经认为葛氏的考察已接近近代的考古调查。明代的顾亭林也“足迹遍天下”，“所至呼老兵逃卒，寻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但是，这种野外调查之风并没有蔚然兴起。

1898年安阳小屯村有字甲骨、1900年敦煌石窟储存大量古代写本文书和其他文物的藏经洞、1926年居延汉简，是近代考古学术史上的三大发现。它们让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眼前一亮：原来到野外也可以找到历史材料。

1899年，德国博物学家K.A.哈贝尔来中国探险，却被义和团强行

扣留在中国沿海。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他发现药铺卖的“龙骨”是脊椎动物的化石——因为中国人相信龙骨可以治疗各类疾病。1903年，德国古生物学家施洛塞尔研究了哈贝尔的收藏，认为他所收藏的一枚臼齿可能是古人类的化石。这一发现吸引了外国的一些古生物学家来中国开展有组织的科学田野考古工作，填补了远东古生物学的空白。

清代末年，科举废除，使一批青年知识分子走出书斋成为可能。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由于政府提倡实业，地质调查开始进行。

“五四”之后，各类思想空前活跃，史学界兴起了一股“古史辨”的思潮。旧的古史体系靠不住了，胡适、钱玄同等学者主张用挖出来实实在在的东西证明民族的历史。

这就是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的学术需求、社会需求和思想需求。

20世纪20年代，中国国内先后成立了三个与考古学有关的研究机构，各自开展以田野考古为特征的近代考古活动：一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考古学研究室，二是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科，三是农商部的中国地质调查所。后者偏重于史前考古，前两者则更注重历史时期考古。从对外联系看，大体上北大与日本交往多，清华与美国关系深，地质调查所与欧洲联系广。

1921年，第一枚北京猿人牙齿化石的发现、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遗址的发掘被公认为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传入。1921年底，北大调整研究所结构，率先成立的国学门下设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5个研究室，考古学研究室由著名的金石学家马衡先生主持，同时特辟陈列室，陈列本校所藏的古器物及金石、甲骨拓本等文物。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先生为寻求与国外考古学界的合作，主动派人访求日本的考古学巨擘滨田耕作。滨田氏为萌芽状态的中国考古学建设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将考古学与美学相联系，而不仅作为史学的辅助研究；应预定计划，以便将来组建独立的考古学研究所；应视考古研究为自然科学，与理科的生物学相等；同时搜集中国和西洋的材料，进行比较研究，以免偏蔽等。1922年9月，沈兼士发表《筹划北京大学研



究所国学门经费建议书》，指出“欲扫除旧金石学之弊病，必需集合各专门学者组织古物调查发掘团，用智慧的测量，为考古的发掘”。

北大引进考古学之初，立意很高，例如胡适聘安特生（Andersson）来北大讲授比较古物学，学校曾先后请甲骨学家罗振玉、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美国芝加哥博物馆人类学部主任劳佛（Berthold Laufer）、斯密苏尼恩博物院调查古迹代表毕士博（Carl Whiting Bishop）等办讲座，开设课程以及担任考古研究室的通讯导师，并且在1923年5月24日组织古迹古物调查会，宗旨为：用考古学的方法调查研究中国过去人类之物质的遗迹及遗物。由马衡担任会长，计划先自调查入手，“并为发掘与保存之预备”，待经费落实，再组织发掘团。该组织章程要求网罗地质学、人类学、金石学、文字学、美术史、宗教史、文明史、土俗学、动物学、化学各项专门人才协力合作，可谓“取法乎上”。

1924年，李玄伯写了《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指出，“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我们只有走考古之路，通过地下的发掘，挖出实实在在的东西才能证明我们的历史是对还是不对。”“古史辨”阵营的领军人物顾颉刚则回应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走考古学之路“确是极正当的方法”。

最早在中国进行考古的都是清一色的外国人，其中有些是学者，有些是探险家，有些则是盗窃文物的。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深受刺激，他们决心搞自己的考古学。1926年，刚从美国学习人类学归来的李济先生到山西夏县的西阴村进行发掘，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独立进行的田野考古。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筹备），内设考古组，中国从此有了考古发掘的专门机构。当年董作宾先生就去小屯进行了发掘。第二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所成立。

北大的古迹古物调查会（后更名为考古学会）成立后，组织了数次考古活动，在北京（北平）的有：1924年12月，对圆明园文源阁等的调查；1929年10月，发掘了北平西城大木仓胡同西口中国大学院内

发现的唐代件钦墓，获唐初瓷器，并据墓志文字初步确定唐幽州城方位等。

二、周口店北京猿人

在西学东渐和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传入过程中，北京考古活动的起步要略早一些——虽然第一步的迈出是如此稚嫩而蹒跚，但却是坚决而深远的……

1. 旗开得胜

北洋政府统治期间，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存在巨大的实力差距引起了执政者的不安，产生了依靠科学技术发展国家经济的迫切愿望。在这种背景下，带有找矿目的的地质专业被优先提到发展日程上来。于是政府选择瑞典著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安特生作为农商部的矿政顾问，专门指导在中国的采矿事宜。这一方面是因为安氏本身是国际知名的专家，另一方面北洋政府认为安氏不是来自于西方列强国家，不会带有帝国主义的利益驱动。

1918年在北京考古史上有着发轫的一笔。2月的一天，安特生偶遇一位在北京大学教化学的朋友吉布。未及多谈，吉布即向他出示一包裹着红土的碎骨化石，说是刚从郊区房山周口店一个叫鸡骨山的地方采集的，并告之那里有类似堆积物的洞穴，裂隙很普遍。这个线索引起了安氏的兴趣。于是他于3月22日只身前往，进行了两天的考察。

安氏到达后，很快就在火车站南面约2公里处找到了鸡骨山，它其实是一座石灰岩小残丘。吉布的化石就是在一条裂隙里的深红色砂质黏土中发现的。这些化石多半属于啮齿类或鸟类，骨头细小，当地百姓误以为是鸡骨，这座小山也因此而得名。

安氏在这里对一小块遭到破坏的含化石的堆积物进行了小规模试